

## 〈論説〉

# 从报刊启蒙到“启蒙”报刊

——民国报人曾虚白早年生涯（1895–1937）

刘 洋\*

**摘要：**从1895年开始，新式报刊作为一种新媒介，在较长时间内主导彼时的媒介环境，形塑时人的媒介认知。以出生于1895年的报刊“原住民”曾虚白为个案，文章指出：在传统经典淡出之后，新式报刊在新知、社会交往等方面给予幼年曾虚白以另一种启蒙的价值。新式报刊（主要为维新报刊）所具有的启蒙、精英主义的特质又在无形中规定了曾虚白的媒介想象，进而影响其晚报实践，使《大晚报》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小报和日报的第三条道路，从而对报刊界发挥启蒙意义。随着国难日深，恰是早年媒介影响下生成的危机意识与报国情怀，最终驱使曾虚白自报界而踏入政界，完成从记者到新闻官的转变。

**关键词：**曾虚白；《大晚报》；国民党；转型时代

**要旨：**1895年から、新しいスタイルの新聞と雑誌は新しいメディアとして、メディア環境を支配し、より長い期間に当時のメディア認識を形成された。1895年生まれの曾虚白を個別事例とし、著者は次のように指摘した：伝統的な儒教の古典が衰退した後、新しいスタイルの新聞と雑誌は、

---

\* 刘洋，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flyoung1992@163.com，“2023年爱知大学 ICCS 若手研究者助成”相关成果

新しい知識と社会的交流などの方面で、当時まだ子供だった曾虚白に啓蒙の価値を与えられた。また、新しいスタイルの新聞と雑誌（主に変法派の新聞と雑誌）の啓蒙的、エリート主義的な性格を持って、逆に曾虚白のメディア想像力を形成し、それが彼の夕刊の内容や形態に影響を与え、『大晩報』も従来のタブロイド紙や日報とは異なる3つ目の道から踏み出し、新聞界に啓蒙的な意味を発揮させた。それに国難の日々の深まりに伴い、往年のメディアの影響で生成された危機意識と往年のメディアの影響で生成された危機意識と国家の恩に報いるため、曾虚白は新聞界から政界へと追いやられ、ジャーナリストから報道官への転身を遂げた。

キーワード：曾虚白、『大晩報』、国民党、転換時代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作为一个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孩子，他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完全属于前电视时代的人’”<sup>1</sup>。在《图像证史》中，彼得·伯克引述已故历史学家拉菲尔·塞缪尔的自我评价，意在表达为何老一辈历史学家“依然依赖档案库里的手抄本和打字文件”<sup>2</sup>，而绝少使用摄影档案。按照塞缪尔的表述，历史学家（自然包括普通民众）出生的年份、所属的世代，或将决定其与何种媒介类型发生关系，并进一步决定其对于媒介的认知和使用。

这自然引发作者的思考，究竟“前电视时代的人”呈现何种思维“风景”？放置本土语境，出生于清季的新世代、新式报刊的“原住民”们，是如何“观看”并使用这一新媒介，其“观看”方式又如何进一步形塑其报刊实践？

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1895年极为特殊。在此之前，新式报刊虽已进

---

1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第二版）》，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页。

2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第二版）》，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页。

入中国，但办报主体多为西来传教士及外商，虽偶能干预时政<sup>3</sup>，甚至被视作“打探西方”的工具<sup>4</sup>，但尚未在社会肌理层面形成制度性力量。

一直到甲午战后，举国震动，中国知识群体才开始利用新式报刊，“撼动原有的政治与社会阶序”<sup>5</sup>。1895年以后，“最初由于政治改革运动的带动，报刊杂志数量激增”<sup>6</sup>，“时适中日战后”，方“一时报纸，兴也勃焉”<sup>7</sup>。同时，按照张灏先生的观点，1895年恰是“转型时代”（1895-1925年）的发轫之年。所谓“转型时代”，即“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而包括新式报刊在内的传播媒介，正是在这一时期实现“突破性的巨变”。<sup>8</sup>

不难看出，1895年之后，新式报刊主导了彼时的媒介环境，成为在潜移默化中滋养民众感知结构的“大江大海”。这就引出如下问题，在由新式报刊主导的媒介环境之下，报刊“原住民”如何经验新式报刊甚至进一步影响其媒介实践的呢？在此，笔者选择以1895年出生的曾虚白为个案，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为什么是曾虚白？首先，曾虚白出生于1895年，耳濡目染，正是新式报刊的“原住民”，经由此个案，有助于我们窥见曾虚白所属的这一世代知识分子的媒介经验。

其次，从职业抉择来说，曾虚白日后选择新闻传播业，从业时间达一甲子之久。恰如曾晚年的回忆，“我努力一生，不论在朝在野，没有离开大众传播这个岗位过”<sup>9</sup>，“我从三十三岁在天津跟董显光办庸报起，此后生活都

---

3 刘增合：《“舆论干政”：〈申报〉与同光之际的西征新疆举债》，《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51-68页。

4 卞冬磊：《“打探”西方：新闻纸在晚清官场的初兴（1850-1870）》，《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4-128页。

5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新北：稻乡出版社，2013年，第103页。

6 张灏：《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38页。

7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13页。

8 张灏：《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37页。

9 马之骥：《新闻界三老兵：曾虚白、成舍我、马星野奋斗历程》，台北：经世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在新闻记者岗位上转”。<sup>10</sup>由此，我们不禁好奇，其早年的媒介经验对其日后“以新闻为业”的职业选择究竟产生何种影响？更进一步，此种经验又如何影响其传媒实践？

再次，曾虚白一生与“新闻”二字缠绕难解，其本应是中国新闻史书写的重要人物。但因“四九巨变”、两岸分治，曾活跃在时代舞台的民国报人大多命途多舛、流落四方，相关研究也因史料收集困难等因素进展缓慢。近年来，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大陆学界对于民国时期新闻人的研究开始回暖。作为民国报人的重要代表，曾虚白在台湾新闻界与马星野、成舍我齐名，并称“新闻界三老兵”<sup>11</sup>。不过，相对于其他两位老兵，关于曾的研究稍显不足<sup>12</sup>。

总而言之，本文以曾虚白为个案，通过其早年的媒介经验与报刊实践，欲探讨如下问题：新式报刊如何规定了以曾虚白为代表的报刊“原住民”的媒介想象？此种想象对其职业抉择甚至人生态度产生何种影响，又如何进一步影响其日后的媒体实践？

## 一、作为“启蒙”的报刊：幼年曾虚白的媒介经验

曾虚白，原名曾焘，字煦伯，生于清光绪乙未年（1895年）。有清一代，曾家为常熟四大家族之一，曾家祖宅至今存留于江苏省常熟县城。曾虚白之父曾朴，系晚清民初纵横文坛的健将，作品《孽海花》流传至今。1935年逝世时，时人评价曾朴毕身文章事业，联曰：平生事业鲁男子，半世风流孽

---

10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序言。

11 马之骥：《新闻界三老兵：曾虚白、成舍我、马星野奋斗历程》，台北：经世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12 2023年5月18日晚，笔者分别以“成舍我”“马星野”“曾虚白”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中搜索，相关搜索结果分别为308条、55条、29条。如果考虑到曾虚白的多元身份，不少研究者是从文学角度研究曾虚白，那么其作为新闻人面向的相关研究则更少。同时，围绕马星野，已有专门博士论文，参见王继先：《新闻人马星野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台湾世新大学则专门设立舍我纪念馆，显著提升成舍我的学术关注度。

海花。

就地理空间而言，常熟毗邻上海——这一近代得风气之先在的所在。交通的发展，使沪上的“新鲜空气”常能流经此地<sup>13</sup>。尤其是甲午战败后，举国为之震动，天朝上国居然败于蕞尔小国之手，一时间，士人学子纷纷鼓吹变法。其时，曾朴正当壮年，常赴沪上，结交变法人士。后患病返家修养，曾虚白受其父庭训数载，并由此决定了其幼年的媒介经验。<sup>14</sup>

曾朴对于曾虚白的幼年教育，并不依赖传统私塾的经典——“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反以报刊为启蒙媒介。根据曾虚白1935年的回忆：

我所受家庭教育，根本跳出了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四书五经的旧程序，而致力于新智识的灌输。严复译的天演论和梁编的新民丛报差不多就是启我入知识之门的钥匙。<sup>15</sup>

在晚年自传中，曾虚白就幼时的媒介经验有着更为丰富的陈述：

到了五岁，不读什么千字文、百家姓，就选那时流传的维新派作品，除康梁之外《时务报》、《强学报》、《湘学新报》、《新知报》<sup>16</sup>等刊物都是选读的来源。从我五岁到七岁这两年国家大事又遇到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都出奔逃离，以后签订辛丑和约谢罪惩凶赔款、驻军、削平大沽炮台禁止仇外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父亲在我六岁又染病家居，到我八岁春初才病愈，故此两年病中受国事日非之刺激，除亲自以

---

13 瞿骏：《小城镇里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对地方读书人的文化辐射》，《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160-173页。

14 一说曾朴由沪返常，最初为守孝家居，并在常熟推进新式教育，与地方保守绅士发生争议，虽最终获胜，但在此过程中，患上胃病。参见曾虚白：《履痕心影》，台北：三民书局，1786年，第144-145页。

15 曾虚白：《童年的回忆》，《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期，第57页。

16 《新知报》为讹误，应为《知新报》。

维新派文章教我外，更每日看报引时事为谈话资料，不断以新资讯新思想来教导我这天真待凿的儿子。<sup>17</sup>

由此可以看出，彼时的新媒介——新式报刊，对于幼年曾虚白而言，扮演教科书式的“启蒙”角色。正如旧式文人将传统儒家典籍视为获取知识的基石，在曾虚白看来，报刊是“入知识之门的钥匙”，是他幼年时期知识的合法性来源。作为知识的象征，新式报刊的重要性并不逊于传统儒家典籍。不仅如此，报刊所提供的知识，并非常识，亦非因循守旧的陋见，而是一种“新资讯”。这种“新资讯”，可以成为父与子之间的“谈话材料”，因而产生某种“新思想”，更具有一种“启蒙”意义。

实际上，随着近代西潮的冲击、致用思想的抬头，甚至1905年科举制的取缔，传统儒家经典逐渐“祛魅”，日趋势衰。同时，底层的士林学子则兴起学习西方知识的热潮。其中，新式报刊在西学的传播中扮演关键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启蒙曾虚白的新式报刊，并非“诲淫诲盗”的商业小报，而是维新派主办的政论报刊。此种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曾虚白幼年时期对于报刊的想象：报刊应关乎“公”，是为关注国家之兴亡的政论纸，而非承载娱乐事宜、“风花雪月”的琐屑之物。

同时，报刊作为一种新式媒介，甚至改变了曾虚白所处的微小的社会结构——即童年小伙伴所形成的亲密群体。幼年本是天真浪漫时，却因“报刊”的关系，曾家的小孩“空闲下来，谈天说地的话题，倒多些是国家大事”，到后来，谈天说地畅聊国事已不“解渴”，“我们由个别的谈话转变而成开会的形式”。<sup>18</sup>

对此，康有为早有论述，在其想象中，办报之阶段性目的，便是开会，最终达致合群开风气的地步。“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办事有先后，当先以报通耳目，而后

---

17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28页。

18 曾虚白：《童年的回忆》，《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期，第57页。

可举会”。<sup>19</sup>

诚如康氏所说，报刊作为新式媒介，的确改变了孩童之间的交往关系，并因“通”了曾虚白等童子的“耳目”，而具有“公”的性质，它提供公共议题以联结读者，并导向某种讨论的氛围，甚至成为幼年曾虚白生命中“经验的一般性结构”。<sup>20</sup>

正是在这种新知识与新交往的媒介经验中，曾虚白加深了对于报刊的体认。对他而言，新式报刊（以维新报刊为主）发挥多重“启蒙”作用：其一，新式报刊作为传播新知的媒介，所传递的内容，替代了传统经典，给曾虚白以启蒙；其二，报刊作为一种新式媒介，无形中改变了曾虚白所处微观社会的交往关系，此种媒介经验，对于一张白纸的报刊“原住民”曾虚白来说，是另一种“启蒙”；其三，维新政论报刊所具备的精英主义与启发民智的特性，影响了曾虚白对于报刊定位的体认与想象，并“润物细无声”般地影响了其日后的报刊实践。

## 二、辗转记者路：曾虚白的职业选择

“我在大家庭里做大少爷的身份，但回老家绝不是我的路，是毁我终身的陷阱。我的路在社会里，为颠危的国家开一个新局面，是我应取的方向。”<sup>21</sup>晚年曾虚白如是回忆。此种危机意识与报国情怀，在曾虚白幼年即已流露，“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小姑娘谈到国是前途，竟会流出泪来”。<sup>22</sup>

曾虚白的“早熟”，与新式报刊的启蒙自然不可分割。不过，何以“为颠危的国家开一个新局面”，最终会落实到记者这一职业上？毕竟，在最终以记者为业前，曾虚白有过多番辗转。

职业问题一直是困扰曾虚白的一大人生问题。抱持“为颠危的国家开创

---

19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9-30页。

20 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讲》，陈玉箴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3页。

21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59页。

22 曾虚白：《童年的回忆》，《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期，第57页。

一个新局势”的信念，就意味着，职业势必成为曾虚白救国理想与人生道路之间的接榫点。自1918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曾虚白从北京的烟酒公卖局务工，再到天津的直隶省交涉使工作，数度更换职业，试图寻求既能解决温饱亦能实现理想的职业。频繁“跳槽”，恰恰折射出曾虚白之理想与现实境况间的挣扎。

就以天津的直隶省交涉使这一职务为例。在任期间（1924年），曾虚白见证了收回天津俄租界等重要事件：

自中俄协约签订，苏联政府承认抛弃所有中国境内俄租界，在表面观之，似无若何困难，然接收稍一不慎，出入之间，实于国权影响深大……六日下午二时，在旧俄界工部局会议，当开会之时，与会者交署祝交涉员、科长曾煦伯、秘书董显光、董事道胜银行行长斑定赉……<sup>23</sup>

曾煦伯，即曾虚白。即便有机会身与重要事件，但他认为，所在机构仅是“帮助省长接见外宾的一个酬酢机构”，而与“外交部拉不上任何关系”，便又“完全恢复了过去心灰意懒的绝望”。<sup>24</sup>在其“心灰意懒”之时，曾虚白在工作中邂逅了董显光，在晚年自传中，他称董为帮助他“决定终身事业应走那条路的人”<sup>25</sup>。

董显光是谁？作为中国报刊史上的著名报人、曾虚白一生的挚友<sup>26</sup>，董显光先后求学于美国新闻学教育的重镇——密苏里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归国后，董氏任职于多家报社，包括《国民日报》《北京日报》《密勒氏评论报》等。在政治上，他一直与国民党人士较为亲近，从回国之航船上邂逅孙中山并与其订交，到军阀混战期间与熊希龄关系亲密。此外，他也注意与非国民党员的“华北大部的政治领袖们，保持接触”，把

---

23 《津埠接收俄界经过纪详》，《申报》，1924年8月13日，第10版。

24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69页。

25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70页。

26 曾、董二人在赴台前的命运，始终相连，仿若“双子星”，在两人的自传中，彼此均占很大分量。其中，《董显光自传》以英文写成，中文译者则是曾虚白。



握“政治的动向”<sup>27</sup>，其中就包括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人。

1925年，董显光决定创办《庸报》，“拿自己历年积蓄的几千元国币创办一份中文报”<sup>28</sup>。问题在于，董显光虽英文能力卓越，但中文“实在不敢令人恭维”<sup>29</sup>。因此，当董显光创办《庸报》之际，出生文学世家且自幼浸淫于新式报刊媒介环境中的曾虚白，恰成为董氏所需的那支“有国学基础挥写自如的笔”。<sup>30</sup>

在几次长谈中，董氏将“从事新闻事业贡献如何大，兴趣如何高”如数家珍地给曾虚白“上了几堂课”，将本是新闻学门外汉的曾虚白说得“手舞足蹈”，自此，曾虚白由衷地“认定新闻事业做我的终身职业”。<sup>31</sup>

曾、董几次长谈究竟说了什么，甚至让曾虚白抱定“以报刊为业”，未见于史料。但结合董显光在美留学经历，或可对此作合理推测。董显光于1909年至1913年间，陆续在美国的巴克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肄业）求学。后两者如今依旧是美国新闻学教育的重镇。彼时美国传媒界正盛行“传媒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潮。该主义认为，“传媒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提供各种事实和观点作为判断的基础，来帮助公众揭露真相，协助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同时，“它有责任防止政府越界”<sup>32</sup>。这些内容，对于董氏而言，不仅是课堂所学知识，恐怕亦是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感知。而当董显光将此类内容转述曾虚白之时，必然对久居国内的曾虚白造成影响。毕竟“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恰为曾虚白所心心念念。

投身传媒业的愿景，虽令曾氏“手舞足蹈”，但唯有具体实践中持久性的正向反馈，才能形成稳定的职业认同。

曾虚白加入《庸报》后，由于该报日益蓬勃，董显光拟将武汉定为国内

---

27 董显光：《董显光自传》，曾虚白译，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第39页。

28 董显光：《董显光自传》，曾虚白译，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第44页。

29 艾飞：《新闻·局长·董显光：“新闻的成分比局长的成分多”》，《新闻天地》，1949年第55期，第17页。

30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71页。

31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71页。

32 Fred S. Siebert等：《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43页。

采访网的中心，其时，吴佩孚坐镇汉口，为诸军阀中势力最大者。为投入已然“着了迷”的新闻事业，曾虚白辞去工作，从天津赶赴武汉，在吴佩孚军中开展新闻业务近一年。这段采访经历对曾虚白影响颇深，其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亦难掩兴奋：

我能在短短不到一年期间中，亲身体验到中国政局最重要的转捩关头，接触其核心人物，了解其运用策略，真使我初试记者工作自庆得到了意外的成功。<sup>33</sup>

显然，这种兴奋感与在公务员任上的“心灰意懒”对比鲜明。毕竟，作为记者，曾虚白直接获得了和当时的“风云人物”近距离的接触机会和交往可能。随军期间，他和“军师”张其铨“搅得最熟”，甚至在官方场合出任吴佩孚之翻译，可见后者对曾氏之信任。1926年5月26日，《申报》曾报道称：

当晚八时，吴在华商总会设宴欢迎，并请各国领事及各界领袖为陪宾，吴亲到致欢迎词，由曾焘翻译，谓领事裁判制度，为十九世纪旧产物，为各国所唾弃，侵略主义之污点……<sup>34</sup>

“曾焘”系曾虚白本名。在采访吴佩孚的过程中，曾虚白无疑置身政治漩涡的中心，与“总司令部的核心人物来往”，对于不确定的时局，往往能够得到对于“当时局势的全部了解”<sup>35</sup>，在幕后寻得某种确定感。

不过，随着吴佩孚的败走，国民革命军势力崛起，逼近南京。曾虚白闻风而动，欲在金陵借助乃父曾朴的帮助，在此地开展采访。但就在此际，曾朴因与江浙军阀孙传芳起了争执，一气之下，挂冠而去，拟在上海开办新式

---

33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79页。

34 《吴陈欢宴法权委员会》，《申报》，1926年5月16日，第5版。

35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76页。

书店——真美善书店<sup>36</sup>。1927年，在父亲的再三劝说之下，三十四岁的曾虚白奔赴上海<sup>37</sup>。俟其再度进入报界，则是四年后的1931年。

### 三、“启蒙”报刊：作为“大”报的晚报

1930年前后，真美善书店因经营不善而歇业，曾朴返回常熟大宅静养，而曾虚白则被聘为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1931年6月，曾虚白还在学院毕业生的仪式上发言。<sup>38</sup>不过，就在3个月后，他再次踏入报刊界<sup>39</sup>。

1931年秋天，曾虚白收到张竹平创办一份晚报的邀请。起初，曾虚白对办报并未有太大信心，在他看来，《庸报》一年，只是“学徒”而已。不过，张竹平则劝慰他，“办报并没有什么精神奥妙的诀窍，完全只靠常识的运用”。<sup>40</sup>

虽然曾虚白此前并无丰富的办报经验，但后来的报刊实践中证明，曾虚白一改晚报的积习，甚至让上海市民养成“一天看两次报的习惯”<sup>41</sup>。因此，无论是对报界，抑或读者阅读体验而言，曾虚白几乎重塑了晚报的可能性。

在投身晚报界前，晚报之于曾虚白，与“小报”无异，甚至就是“小报”的代名词，总而言之，均属于“文人墨士耍笔杆消遣没出息的刊物”。因此，在晚报筹办阶段，曾虚白直接将这份新报定名为《大晚报》。一个“大”字显示曾氏要将新创的晚报，办成如日报般“伟大形态和内容”的决

36 此处需特别指出，曾朴曾虚白父子手创之书店与刊物，其名均为“真美善”，而非“真善美”。然提及曾之学术论文与普通文章，多误作“真善美”。如邱家宜：《战后初期的台湾报人：吴浊流、李万居、雷震、曾虚白》，台北：玉山社，2020年；王洪钧：《曾虚白传》，载张世瑛编：《“国史”拟传》（第十一辑），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201-232页。

37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108页。

38 《各校行毕业礼》，《申报》，1931年6月22日，第13版。

39 此处的报刊更多指涉新闻报刊，在经营真美善书店期间，曾氏父子实则亦发行《真美善》文学杂志。

40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108页。

41 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上海通志馆，1935年，第87页。

心，也借此与他不大看得起的“小报”相区隔<sup>42</sup>。

对于“小报”，曾虚白早有不满。在与其父一道主持《真美善》杂志期间，曾虚白即认为，小报只是“兴奋剂”，是一种“浮光掠影”的读物：

他们（中国的人）对于读物的态度不愿有深入的欣赏，只愿浮光掠影般在表面上盘旋下子。假令在表面上他们遇见了异常的，快意的，有刺激性的兴奋剂，他们就高兴起来，这一份读物就成了大家的恩物。于是小报，剑侠传和什么姻缘，什么奇缘都不胫而走全国了。<sup>43</sup>

在更早之前，作为大学生的曾虚白，亦曾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刊《约翰声》<sup>44</sup>撰文表示，“风花雪月，腾诸报章，亥豕鲁鱼，传诸刻本，非但文学之羞，亦世道人心之害”<sup>45</sup>。

结合曾虚白幼年的媒介经验，不难理解，蒙受维新报刊熏陶、深具危机意识与家国情怀的他，难免将报刊视作启蒙和传播知识的平台，而非“风花雪月”的读物。

同时，对于彼时的大报，即日报，曾虚白亦不甚满意。在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虚白提到：<sup>46</sup>

在这革命军统一全国，大学院明定语体文（即“白话文”）的地位之后，国内的日报还是死气沉沉地保卫着“之乎者也”的老调，未免过于滑稽了。在他们办报的，当然也有他们的困难……我的主张，第一步应该从改良第一张入手，自己的稿子当然没有问题，就是通信社的来稿，如要

---

42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108-110页。

43 虚白：《给全国文艺工作者一封公开信》，《真美善》，1928年，第2卷第1期，第7页。

44 经笔者统计，曾虚白在《约翰声》共撰文16篇，大多为译作及校园纪事《约翰春秋》。

45 曾虚白：《论中国宜设学士会（Academy）》，《约翰声》，1916年，第27卷第9期，第2页。

46 虚白：《从办什志说到办日报复林樵民》，《真美善》，1928年，第2卷第5期，第8-9页。

采入第一张的，一概改成语体。以后再慢慢扩张，一边劝告通信社，一边自己努力那就不愁不在报界开一个新纪元。这句话，在现在还是我的一种计划，可是最终要实现的。

“语体文”即“白话文”，1928年距文学革命已近10年之久，而国内大部分日报依旧流行“文言文”，曾虚白对此提出倡议，并意欲从改革语言开始，在报界开一个新纪元。

可见，一方面，曾虚白难以忍受小报的“风花雪月”；另一方面，对于大报（日报）的语体亦不甚满意，甚至在编辑《真美善》文学刊物时，便有上述“计划”。

等到正式开办《大晚报》，上述想法便有了落地的土壤。关于《大晚报》草创时的设想，曾虚白有着较为详细的叙述，大体而言，以“一切要创新，一切要特意”为总宗旨，并分为四条基本原则，首条原则便开宗明义，“全报各版，不论评论、新闻、附刊”，“一律全用语文体”<sup>47</sup>。可以说，这一原则与早先的计划，颇为符合了。

《大晚报》创办之初，恰逢“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人口突增了好几倍”<sup>48</sup>。在此种情况下，曾虚白大胆任用黄震遐、张若谷等战地记者，并同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建立了直接交谈的友谊”<sup>49</sup>。在充分部署和调动资源的基础上，《大晚报》关于“重要战局发展的报道既正确又迅速”<sup>50</sup>。由此，《大晚报》成为上海市炙手可热的晚报。

由于《大晚报》不仅是上海，甚至是全国首家自创采访网、报道当日新闻的晚报，为彼时上海读者带来一种极为新鲜的媒介经验：

一般市民，下午四时就可以看到当天上午发生了什么新事件，这是一种

---

47 曾虚白：《一个外行人办报的经验谈：大晚报创刊经过及对我的影响》，《传记文学》，1969年10月，总第89期，第8-9页。

48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120页。

49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121页。

50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123页。

新经验。<sup>51</sup>

可以说，在曾虚白的努力下，《大晚报》有别于以往晚报的“小报”化，走出一条介于“日报”与“小报”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大晚报》之发行量，迅速突破曾最初对张竹平“三万份”的军令状，最高时日销八万份，超过《申报》、《新闻报》等老牌大报在上海的销数<sup>52</sup>。

《大晚报》的成功，使得上海报界发现，晚报作为一种报刊类型，另有一种实践的可能性。故在数月间，接连新创的晚报达四五种之多<sup>53</sup>。这在战时“银根紧缺”的背景下，颇为难得。故时人胡道静指出，《大晚报》之出世，直接推动“上海晚报盛行的伟大的效果”<sup>54</sup>。因此，无论对于报界，抑或市民，曾虚白及其手创的《大晚报》，均具有启蒙意义：原来还有如此这般的“晚报”。

由于“一·二八事变”期间，《大晚报》在民众心中建立极高的地位。当战后《大晚报》重心由战争新闻向社会新闻转型时，甚至有读者一时难以接受，写信至编辑部，认为转型后的《大晚报》在“社会新闻”中出现了一些“奸淫偷盗，鲜廉寡耻”之事，失望地表达“污浊的新闻”将有损《大晚报》的“本色”<sup>55</sup>。由此，先前《大晚报》，作为一种类型的晚报，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不过，从后见之明看，转向社会新闻的《大晚报》依旧“声誉一天天提高”，并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发展。<sup>56</sup>

---

51 曾虚白：《履痕心影》，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第130页。

52 闵大洪：《曾虚白与上海〈大晚报〉》，《新闻记者》，1987年第9期，第47-48页。

53 其中，《新闻报》之晚刊《新夜报》、英文《大美晚报》新增刊之中文版，更成为《大晚报》之劲敌。参见曾虚白：《履痕心影》，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第134页。

54 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上海通志馆，1935年，第87页。

55 曾虚白：《社会新闻的意义》，《大晚报》，1932年4月30日。

56 闵大洪：《曾虚白与上海〈大晚报〉》，《新闻记者》，1987年第9期，第47-48页。

## 结语

1933年至1934年，邹韬奋赴欧考察时，留下这番观察：

在巴黎最流行的真正晚报，要算是《巴黎晚报》了……谈起这个报，每使我想起老友曾虚白先生在上海所聚精会神主持的《大晚报》。这两个一在东亚一在西欧的晚报，颇有类似之处。它们都是在本埠最流行的……我看到《巴黎晚报》消息的灵敏，编法的新颖和精神的饱满，每想象那里应该也有一个‘曾虚白’在努力着！<sup>57</sup>

邹韬奋这番观察，足见《大晚报》在中国报刊界的地位及启蒙意义。虽然他敏锐指出《巴黎晚报》与《大晚报》在消息、编法等方面种种相似之处，但孕育中、法两份晚报的文化脉络实则相去甚远。

纵览中国百年新闻思潮，总体呈现为“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sup>58</sup>，然因中国“文以载道”的立言传统，后者分量更为突出。加之无日无之的外部威胁，近代中国报刊更以言论见重，力求救亡图存。这与西方报刊长于记事的特征区别明显，由此赋予了中国报刊“西方报刊所没有的、力挽狂澜的沉重感”<sup>59</sup>。即便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当党治逐渐取代军阀，专职记者取代公雇访员，开启报人职业化之时，中国报刊的言论的传统仍然旺盛<sup>60</sup>。报人追求的，首先还是言论的“一言九鼎”，主笔地位高于记者<sup>61</sup>。

---

57 邹韬奋：《韬奋新闻出版文选》，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58 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

59 卞冬磊：《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晚清报刊阅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60 路鹏程：《中国近代公雇访员与专职记者的新陈代谢：以1920—1930年代上海新闻业为中心的讨论》，《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第30—45、126—127页。

61 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在1934年的一篇理论探讨文章中，曾虚白即将报刊置于现代政治体制的核心位置。对于普通民众，报刊俨然是“一种教育的工具”，最终意在取得孙中山所谓“训政”的效果<sup>62</sup>。通过报刊，混沌于政治的民众将不再“漠然于大事”、冷漠于政治，他们将彻底认清“自己在政治上所得的新地位，他应享的是什么权利，他应尽的是什么义务”<sup>63</sup>。由此，民众的主体得到重塑，成为一个“新人”。一言以蔽之，报纸最终起“新民”的效果。

曾虚白在此点明的，实则是报刊与民众之间，一种近似“老师”和“小孩”间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sup>64</sup>。不难发现，此种“新民”的理念/思维，极为明显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影响。

质言之，此种报刊/媒介—民众关系，自幼便贯穿在曾虚白的脑海之中。上文已经论及，新式报刊（尤其是维新派报刊）作为教科书，在启蒙幼年曾虚白的同时，其政论式、精英式、心怀天下式的类型在潜移默化中规定了曾虚白的报刊想象。同时，地方士绅出身的曾虚白，对于士阶层在地方自治的领导作用亦感受至深，自幼耳濡目染，成年后曾虚白亦一直以此种士大夫的形象自期<sup>65</sup>。

因此，日后手创《大晚报》时，曾虚白在幼年媒介经验的影响下，有意识将《大晚报》与小报区别开，从而完成对晚报界的启蒙。同时，曾氏也以报刊为工具，意在完成对读者的启蒙。在中国整个近代史上，一直弥漫着亡国灭种的焦虑与紧张，并集中爆发于甲午海战之后。张灏即敏锐地指出，自1895年以来，中国思想界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这些思潮都带有浓厚的群体意识，期望把中国自此一危机中解放出来，他们向往着一个未来的中国，并追寻通向那目标的途径”。<sup>66</sup>

变革的时代与救国的抱负，促使曾虚白将“报刊”作为实现救国理想与

---

62 刘洋：《曾虚白新闻思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63 曾虚白：《报纸与政治》，《报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第11页。

64 曾虚白：《报纸与政治》，《报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第12页。

65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8页。

66 张灏：《再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载《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第55-62页。



人生道路之间的接榫点。报刊关涉思想文化层面，直接效果或不如经济与政治建设明显。但诚如林毓生指出，“辛亥革命之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sup>67</sup>。质言之，在彼时的知识分子心中，思想文化的转变，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救国方式。因此，幼时的媒介经验、官场的失意与无聊、家学的濡染、董显光的青睐与影响，使得曾虚白在一拉一推之间，进入了报刊场域，并影响其媒介实践<sup>68</sup>，而启蒙无疑贯穿于曾虚白早年的报刊经验中。

及至30年代中期，抗战爆发，民族危机遽然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救亡压倒启蒙成为主潮。七七事变之后，全国范围内，时局皆“一天紧似一天”<sup>69</sup>。曾虚白一手开创的《大晚报》至1937年前后亦深陷泥潭之中。《大晚报》每年“千万的盈余”，也“给四社拖下水一起沉到谷底爬不起来”<sup>70</sup>，纵使上海闻人杜月笙出手，亦回天乏术。

就在曾虚白面临家庭、职业和国家前途三重危机的关口，密友董显光的提议似乎给他指明了一条路，将个人事业与国家前途完全融为一体，即“参加政府抗日工作”，也正是从这时（1937年）开始，曾虚白亦从一个自由报人向“体制人”转变，并开启了其从记者到“新闻官”的下半生<sup>71</sup>。

---

67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7页。

68 刘洋：《曾虚白新闻思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69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178页。

70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156页。

71 王明亮：《从记者到“新闻官”：国民党新闻管理者的职业抉择与职业悲剧——以董显光、曾虚白、马星野为中心的探讨》，《国际新闻业》，2015年第10期，第127-148页。